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户主属性的关系

——基于长沙、慈利、平江三县的实证研究

曾超群, 曾福生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基于湖南省长沙、慈利、平江三县大样本的农户调查, 考察户主的自身禀赋、环境、社会阶层、家庭规模、健康程度与农户的土地转入和转出流转意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 健康程度等因素与转入土地意愿正相关, 性别与是否愿意转入土地负相关; 与土地转出意愿正相关的有“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村组干部”、“直系亲属中有接受高等教育者”, 说明土地转出意愿与户主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即社会阶层有关。

关键词: 土地流转; 农户; 意愿; 户主属性

中图分类号: F323.2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0)02-0024-07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land transfer's wishes and the head of household's characteristic: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angsha, Cili, Pingjiang Counties

ZENG Chao-qun, ZENG Fu-sh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households of Changsha, Cili and Pingjiang, 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factors such as endowments', environmental impact, social class, family size, health and the will of farmers in 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s that: health level has positively effects on transfer into Land ,sexuality has negative effects; th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land transferred out of the will are "often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nd other big cities," "village and group cadre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who have education degree", coefficient of these variable are positive, indicating the land transferred out h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pacity of head of household to get resources ,which related to social class.

Key words: land transfer; household's; will; household's character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逐渐凸显, 农村土地流转行为日渐增多,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原因的研究较为丰富。周其仁(2003)认为产权和制度是影响中国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理论上, 清晰界定的转让权一

定包含清晰界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 实践中, 经济结构的变化往往是大规模资源转让的结果, 如果转让权受到限制, 潜在的资源转让连同经济增长都会受到阻碍^[1]。叶剑平(2006)等对中国 17 省进行调查后认为, 目前的中国农地市场处于初级阶段, 发育缓慢, 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产权和制度因素是制约中国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农户家庭人口数、非农人口比例、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区位条件等也是显著的影响因素, 规范合同签订与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能够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2]。姚洋(2004)则从农地的转让权与土地市场交易、经济效率角度来分析土地流转行为, 一方面,

收稿日期: 2010-03-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NCET-08-068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JY111)

作者简介: 曾超群(1975—), 男, 湖南邵东人, 博士研究生, 长沙县委副书记。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农地的自由流转提高投资的交易收益,从而间接刺激农户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可称为“交易收益效应”;另一方面,农地的自由流转改善了劳动投入和土地投资的配置效率,即“边际产出拉平效应^[3]”。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户主的社会属性的关系也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如黄宗智提出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和“拐杖逻辑”等概念,并认为土地成为传统农户的生存基础不仅是出于经济收入考虑,而更是小农农户的传统、情感、文化、尊严以及信仰的寄托^[4]。张文秀(2005)认为,农户既是经济单位又是社会单位。作为经济单位,他们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营主体,追求效益或效用最大化,付出最小化;作为社会单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并不是其唯一目标,他们还要考虑生存、就业等保障。因此,影响农户收入、就业、生存的因素就构成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5]。钟涨宝(2003)认为,在既定的农地制度框架下,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普及程度,以及行为过程中的理性化、契约化、组织化程度,都随着区域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 and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在农地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条件下,农户在土地流通过程中的行为不可能做到理性化;即使形成了规范的农地市场,由于农地资源不仅具有生产要素等经济功能,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因而,在土地流通过程中,农户的行为选择也不可能做到理性化^[6]。余艳琴,查俊华(2004)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分析了农地的所有权的模糊性和承包经营权缺乏排他性带来的后果^[7]。孙国峰,郑绍庆(2004)从工业化和商品化两种不同的原始积累过程得到土地所有权的民族国家所有的抽象主体地位不可动摇,但是农民必须完全获得一种准土地所有权意义上的使用权^[8]。高小军(2004)利用现代产权理论,从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三个方面对农地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农户缺乏物权化让渡权是制约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问题,要保护农户的现有的权利,合理界定收益权、并逐步让农户获得物权化的让渡权^[9]。张斌认为,在要不要流转、如何流转等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土地流转缺少必要的可实际操作的法律规范,从

已实行“流转”的实际来看,农村土地流转的控制权主要集中在乡镇(涉农街道)、村(社区)领导手中^[10]。

总体来看,学者们总结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类型,指出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因素,还对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户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规范分析,涉及到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也有一些。有鉴于此,笔者着重关注土地流转的动因与农户特别是户主属性的关系,主要考察户主的自身禀赋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环境影响的因素(包括是否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是否有在沿海地区打工经历、直系亲属中是否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三个方面)、社会阶层因素(包括是否为村组干部)、家庭规模因素(主要指家庭人口数量)、健康程度因素(主要指家庭主要男劳动力的健康程度)等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关系。

二、被调查农户户主及其家庭情况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源于长沙县资助的《长沙县土地流转意愿调查》项目,该项目由湖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部分研究生,长沙、慈利、平江3县县委农办、县统计局以及部分镇村干部研究共同完成。2009年10-12月,项目组选择长沙县、慈利县、平江县进行了调查(表1),三县分别属于省会近郊县、山区县和湖区县,区位条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群众富裕程度以及群众对于土地的观念都差别很大,在湖南有比较突出的代表性。这次调查发放问卷共319户,由于部分调查表格内容农户不想填报(如家庭收入),还有的调查表格填报明显有矛盾,有的内容缺失较多,实际有效调查问卷为175户,本文研究以这些比较完整的175户的调查问卷为基础。

表1 实地调查数据的基本情况

样本县	样本量	调查方法	调查内容
长沙县	100户	问卷调查 深度访谈	户主属性及家庭规模;土地耕作条件;家庭经济状况;土地流转政策环境;主要流转典型
慈利县	119户	问卷调查	
平江县	100户	问卷调查	

1. 户主性别与文化程度

户主绝大多数为男性,表明农村家庭的男主人占绝对主导地位。从户主的文化程度来看,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普及教育的不懈努力,目前农村农民的基本文化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从调查样本来看,中学教育程度有很大提高,接受初、高中学校教育年限的农户户主已达到57%以上。然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户主仍占据了18.86%,这里面有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人,但也有一些是40-50岁之间的壮年,初中文化程度的户主占了最大份额,令人可喜的是还有大学生回乡创业。

表2 户主性别与文化程度

性别与文化程度		户数	占比/%
性别	男	166	94.86
	女	9	5.14
接受学校教育年限	小学以下	33	18.86
	小学	40	22.86
	初中	69	39.43
	高中	31	17.71
	大学	2	1.14

2. 户主年龄结构

从户主的年龄结构来看,50岁以上的占了41.71%,40-50岁的占了36%,反映出现在青年农民大部分已经外出务工。

表3 户主年龄结构情况

年龄	户数	占比/%
30岁以下	3	1.71
30-40岁	36	20.57
40-50岁	63	36.00
50岁以上	73	41.71

3. 家庭规模情况

从家庭规模的数据来看,农村家庭规模呈现纺锤型结构,即3和4口之家占了大多数,2口之家基本上就是老两口子,孩子们成家后一般独立生活,四代同堂大家庭也较少。

表4 家庭规模情况

人口数量	户数	占比/%
单身	3	1.71
2人	12	6.86
3人	43	24.57
4人	56	32.00
5人	30	17.14

6人	18	10.29
7人及以上	13	7.43

4. 户主是否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

从调查情况来看,30.29%农户户主经常去大城市,表明现阶段的农民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在本社区。

表5 户主是否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

是否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	户数	占比/%
是	53	30.29
否	122	69.71

5. 户主是否有在沿海地区打工经历

沿海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沿海地区打工一方面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以及专业技能的培训。具有沿海打工经历的户主可能具有创业的冲动,从而有可能成为土地流转的活跃因素。从调查数据来看,大部分农户户主有沿海打工的经历。

表6 户主是否有在沿海地区打工经历

是否有在沿海地区打工经历	户数	占比/%
有	111	63.43
无	64	36.57

6. 直系亲属中是否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

良好的教育程度意味着可能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直系亲属中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表明该农户可能从中获得资源支持,从而影响其土地流转决策。

表7 户主直系亲属中是否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

直系亲属中是否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	户数	占比/%
有	65	37.14
无	110	62.86

7. 户主是否为村组干部

按照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乡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的上层,他们拥有的资源要比普通农户丰裕,所以本文考察了户主是否为乡村干部与土地流转的决策意愿的相关性。

表8 户主是否为村组干部

是否为乡村干部	户数	占比/%
是	30	17.14
否	145	82.86

8. 家庭主要男劳动力健康程度

男性作为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其身体健康程度与其农业经营的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图从这个方面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以了解主要男劳动力健康程度与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关系。

表 9 家庭主要男劳动力健康程度

家庭主要男劳动力健康程度	户数	占比/%
非常健康，能从事如挑担等重体力劳动	67	38.29
身体一般，能从事不太繁重的体力劳动	83	47.43
身体不太好，仅能从事一般的家务劳动	16	9.14
身体不好，基本不能从事体力劳动	9	5.14

三、实证分析

湖南 3 县 175 户农户的有效调查表明(表 10)，希望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数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当然各地的情况是有差异的，长沙县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很强；慈利县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户转入土地的积极性很高；平江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户参与土地流转意愿不强。

表 10 土地流转意愿情况

是否愿意参与土地流转	户数	占比/%
希望转入土地	49	28.00
希望转出土地	38	21.71
既不希望转入也不希望转出土地	88	50.29

本文从转入和转出两个角度来分析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在分析农户“是否愿意转入土地”时，“愿意转出土地”当作“不愿意转入土地”来处理(赋值 0)；同样在分析农户“是否愿意转出土地”时，“愿意转入土地”当作“不愿意转出土地”来处理(赋值 0)。

(一) 农户“是否愿意转入土地”的实证分析

1. “是否愿意转入土地”的计量分析模型

考虑到因变量“是否愿意转入土地”是一个二分的定性变量，即要么“愿意转入土地”要么“不愿转入土地”这两种可能，笔者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土地流转意愿。

$$P(Y = 1 | X) = F(\beta_1 + \beta_i x_i)$$

式中 $P(Y = 1 | X)$ ，表示解释变量为 X 时，愿意转入土地的概率，解释变量 X 的说明见表 11。

表 11 解释变量赋值

解释变量	赋值	
户主性别	男	1
	女	0
户主接受学校教育年限	小学以下	0
	小学	1
	初中	2
	高中	3
户主年龄	大学	4
	30 岁以下	0
	30 - 40 岁	1
	40 - 50 岁	2
是否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	50 岁以上	3
	是	1
	否	0
是否有在沿海地区打工经历	有	1
	无	0
直系亲属中是否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者	有	1
	无	0
是否为乡村干部	是	1
	否	0
家庭人口数量	单身	实际值
	2 人	实际值
	3 人	实际值
	4 人	实际值
	5 人	实际值
	6 人	实际值
	7 人及以上	实际值
家庭主要男劳动力健康程度	非常健康，能从事如挑担等重体力劳动	3
	身体一般，能从事不太繁重的体力劳动	2
	身体不太好，仅能从事一般的家务劳动	1
	身体不好，基本不能从事体力劳动	0

2. 研究假设

假设 1：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的思想观念有关，

户主年龄越大越希望转入土地；

假设 2：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的创业能力有关，文化程度越低者越希望转入土地；

假设 3：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承担劳动的体力有关，男性户主希望转入土地；

假设 4：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同外界的交流接触程度有关，不经常去大城市的户主希望转入土地；

假设 5：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的从业经历有关，没有沿海打工经历的户主希望转入土地；

假设 6：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关，直系亲属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户主倾向于转入土地；

假设 7：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关，不是村组干部的户主倾向于转入土地；

3. 回归结果

分析工具采用 Eviews6.0 统计软件，计量结果见表 12。

表 12 回归结果

自变量	参数估计值	标准差	z 统计量	t 统计量的 收尾概率
教育程度	- 0.025 306	0.122 537	- 0.206 520	0.836 4
年龄	- 0.116 523	0.126 735	- 0.919 418	0.357 9
家庭人口数	0.077 137	0.073 345	1.051 702	0.292 9
性别	- 1.462 086	0.398 151	- 3.672 188	0.000 2
经常去城市	0.025 513	0.288 857	0.088 323	0.929 6
外出务工	0.128 688	0.283 594	0.453 777	0.650 0
高等教育	- 0.050 037	0.240 075	- 0.208 421	0.834 9
干部	- 0.383 043	0.308 386	- 1.242 088	0.214 2
健康程度	0.242 824	0.146 158	1.661 382	0.046 6

4. 小结

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在 5% 的置信水平显著的只有“性别”、“健康程度”2 个自变量，而“家庭规模”自变量，即家庭人口数量的系数虽然为正，但 Z 统计量并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年龄”、“直系亲属中是否有接受高等教育者”、“干部”这几个自变量的系数的统计量虽然不显著，但传递了一个负向的信息。

(1) 计量模型中的“健康程度”与“是否愿意转入土地”正相关，这表明，尽管随着经济

的发展，农业的装备水平越来越高，农业机械以及化学除草剂的广泛使用有效地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强度，但农业生产还是一个体力活，身体吃不消的人没有要求增加耕种土地面积的倾向，只有身体健康，能够扛下所有农活的人才希望通过流入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来增加家庭的收入，改善家庭的福利水平^[11]。如果户主是农业种植大户，甚至是专业户，那么他转入土地就比转出土地的意愿要强。作为种植能手，无疑要求身体相当健康。

(2) 模型中的户主“性别”与“是否愿意转入土地”负相关，并且系数的 Z 统计量值高度显著，也就是说，户主为男性的农户转入土地的意愿比较低，而户主为女性的农户转入土地的意愿比男性高，这个结果很有意思。按照一般的想法，女性户主应该不会比男性户主种地的积极性高，经过反复的考证与比较，笔者发现农村中妇女当家(即户主)的家庭很少，但这种家庭的夫妻组合一般都有个特点：妻子比较能干泼辣，丈夫比较胆小怕事甚至有点懦弱，由于丈夫能力相对较弱，在外边受欺负，一般都在家里务农。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老实憨厚的丈夫在外面打工老是被工头克扣工钱，别人一天 80 块而他只有 50 块，有一次单独结了 1 000 块钱的工资却有 3 张假百元钞票，从那以后，他妻子再也不要他外出打工了。由于这类农户的男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劳动，而家中的土地有限，所以转入土地的意愿要比男户主农户强烈。

(二) 农户“是否愿意转出土地”的实证分析

1. “是否愿意转出土地”的计量分析模型

考虑到因变量“是否愿意转出土地”是一个二分的定性变量，即要么“愿意转出土地”要么“不愿意转出土地”这两种可能，笔者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

$$P(Y = 1 | X) = F(\beta_1 + \beta_i x_i)$$

式中 $P(Y = 1 | X)$ ，表示解释变量为 X 时，不愿意转出土地的概率，解释变量 X 的说明见表 11。

2. 研究假设

假设 1：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的思想观念有关，户主年龄越小越希望转出土地；

假设 2：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的创业能力有关，

文化程度越高越希望转出土地；

假设 3：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承担劳动的体力有关，女性户主希望转出土地；

假设 4：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与外界的交流接触程度有关，经常去大城市的户主希望转出土地；

假设 5：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的从业经历有关，有沿海打工经历的户主希望转出土地；

假设 6：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关，直系亲属中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户主倾向于转出土地；

假设 7：假定土地流转与户主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关，是村组干部的户主倾向于转出土地；

3. 回归结果

分析工具采用 Eviews6.0 统计软件，计量结果见表 13。

表 13 回归结果

自变量	参数估计值	标准差	z统计量	t统计量的 收尾概率
教育程度	-0.056 042	0.134 850	-0.415 590	0.6777
年龄	-0.090 252	0.158 476	-0.569 501	0.5690
家庭人口数	-0.118 047	0.089 578	-1.317 804	0.1876
性别	0.460 262	0.575 317	0.800 014	0.4237
经常去城市	0.724 631	0.312 409	2.319 493	0.0204
外出务工	0.195 116	0.327 486	0.595 799	0.5513
高等教育	0.471 326	0.258 440	1.823 735	0.0682
干部	0.615 389	0.316 679	1.943 258	0.0520
健康程度	-0.412 386	0.150 062	-2.748 101	0.0060

4. 小结

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在 5% 的置信水平显著的有“健康程度”，“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在 10% 置信水平上显著的有“直系亲属中有接受高等教育者”、“村组干部”。

(1) 与研究假设“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转出土地”完全相反，该变量前的系数却为负，即文化程度越高转出土地的意愿越低，但 Z 统计量并不显著。这个结果与钟涨宝，汪萍(2003)的调查分析的“教育水平较高、具有非农就业的经验的农户出租其农地的可能性较大^[12]”结果不一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钟涨宝等的文章是通过调查数据得到的一个直观性判断，并没有通过严格的计量检验。虽然我们会看到几个相对学历较高的样本户主

把土地流转给别人，但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导致土地流出的意愿上升”。

(2) 与“是否愿意转入土地”的计量分析结果相吻合的是，在分析“是否愿意转出土地”时，“健康程度”系数为负并且高度显著，也就是说主要劳动力的身体状况越好，转出土地的概率越低，这是很正常的结果。反过来，主要劳动力身体健康程度不佳的农户转出土地的概率较大，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也就是说在流出土地的农户中是否存在身体健康原因无法耕种土地的“被迫流转”问题，如果有，这部分家庭由于男劳动力身体不好本来就收入低，医药费用支出高，又被迫放弃土地，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怎么解决。很可惜，本次调查由于时间与经费支持原因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深度调查找出案例，在实证结果出来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3) “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这个自变量前系数为正并且 Z 统计量高度显著，这个很好理解。能够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的农民可能是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人或商人或雇员，他们实际已经离开了农业，只是还具有农民的身份，土地对他们的边际价值低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

(4) 村组干部这个自变量前系数为正且其 Z 统计量在接近 5% 水平上显著(5.2%)，表明村官们并不想种地，这个结果与其他研究相符。“各阶层的土地流转意愿都与阶层属性呈显著相关。也就是说，从阶层等级来看，收入处于上层的阶层转出土地的意愿最强，而中下层则转入土地的意愿最强。”(陈成文 2009)作为农村社会的管理者，村官们处于农村社会的最上层，他们拥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使他们具有比土地经营更高的收益率要求，并且他们控制的资源可以为他们带来额外的收益，尤其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郊结合部的村组干部，他们所具有财富控制能力远远高于他们的社会阶层。

(5) “直系亲属中有接受高等教育者”系数为正，并且 Z 统计量在 10% 水平显著。这个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是直系亲属中有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农户能够从其直系亲属处获得资源支持而

脱离土地耕作,这个现象在中国很普遍,中国人一般注重聚合传统的家庭与宗族的力量,一荣俱荣。二是一些正在供子女上大学的父母,现在供一个在大城市上学的子女一年的开销在1.5万元以上,很多农村父母还不止一个子女,考虑到供孩子读书的压力,父母们很早就已经进行了家庭经济转型,想别的方法去挣钱了,因为靠土地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支持高昂的读书费用的。

四、结论

(1) 土地转入的意愿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健康程度与转入土地愿意正相关,性别与是否愿意转入土地负相关(女性户主比男户主乐意转入土地);家庭规模即家庭人口数量前的系数虽然为正,但Z统计量并不显著。受教育程度、直系亲属中是否有接受高等教育者、干部这几个自变量的系数的Z统计量虽然不显著;但传递了一个负向的信息,即不具有这几个特征的户主倾向转入土地;但户主年龄也与转入土地意愿负相关(系数不显著),可能是有部分年龄较大的户主,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希望增加土地。

(2) 土地转出的意愿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与土地转出意愿正相关的有“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村组干部”、“直系亲属中有接受高等教育者”系数为正,说明土地转出意愿与户主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即社会阶层有关,一般的农民不会转让土地的承包权,能够转让土地承包权的是农村中的拥有较多其他资源禀赋如社会资源的农户;而土地转出意愿与“健康程度”负相关,即身体健康程度不佳的人倾向放弃土地的承包权,

希望他们是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而不是一种被迫流转。

参考文献:

- [1] 周其仁. 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7-164.
- [2] 叶剑平,蒋妍,丰雷.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于2005年17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J]. 中国农村观察,2006(4):48-55.
- [3] 姚洋. 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8-62.
- [4] 黄宗智.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 中国社会科学,2007(4):74-88.
- [5] 张文秀. 农户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 2005(1):14-17.
- [6] 钟涨宝,陈小伍,王绪朗. 有限理性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选择[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13-118.
- [7] 余艳琴,查俊华. 产权缺失与委托代理失效——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制度的困境分析[J]. 农业经济导刊,2004(5):38-40.
- [8] 孙国峰,郑绍庆.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与经济系统演进中的原始积累问题[J]. 农业经济导刊,2004(5):45-48.
- [9] 高小军. 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路径[J]. 农业经济导刊,2004(8):25-28.
- [10] 张斌,唐家锦,陶小培,等. 对当前农村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 现代金融,2009(3):29-30.
- [11] 宋山梅. 贵州农村土地流转现状调查与对策思考[J]. 农业经济,2009(9):17-20.
- [12] 钟涨宝,汪萍. 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分析——湖北、浙江等地的农户问卷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2003(6):55-64.

责任编辑:李东辉